



多元文明互动下的唐朝西域经略

□ 李光宗

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西域和中原就开始了交往和互动。考古学者曾在阿尔泰巴泽雷克古墓出土了保存完好的中国凤凰刺绣和山字纹铜镜，该古墓的断代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代中叶至公元前3世纪。中国中原地区的物品在西域的出现，充分说明上古时期欧亚大陆交流互动的存在。游牧于黑海、里海以及威海一带的斯基泰人和其他游牧民族成为欧亚大陆文明互动的开拓者，而西域地区早就是欧亚大陆东西方交往互动的一个重要枢纽。那么，中原和西域地区的交流也早于张骞通西域。另外，中国对于西方的了解还有像《山海经》那样的传说呈现，更是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

因此，学者王永平在《面对全球史的中国史研究》一书中认为，长期以来在中国史研究中较多地强调东亚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和中华文明的独立发展道路，以致造成了一个只有在汉代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国才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错觉。中华文明早在五千年前就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发生了联系，张骞通西域只不过是古代中国开始大规模探索与了解世界的一大壮举。

西域是多元文明互动的熔炉

隋唐时期，西域地区仍然是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交通枢纽和互动中心之一，西域在欧亚大陆文化互

动中起到巨大的作用，欧亚文明在这片壮阔的历史场景之中碰撞与交融。美国汉学家爱德华·谢弗在《撒马尔罕的金桃》中所提到的唐代外来文明，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西域地区传来的，唐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飞禽、走兽到食物、香料，从植物、药品到颜料、矿石，举凡生活所需、日常所用，几乎都有外来文明的踪迹。

西域的文明不仅仅影响日常生活，还波及文明深层之处，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论及西域胡人对中原王朝建筑的影响时指出：“综合隋代三大技术家宇文恺、阎毗、何稠之家世事迹推论，盖其人俱含有西域胡族血统，而又久为华夏文化所染习，故其事业皆藉西域家世之奇技，以饰中国经典之古制。如明堂、轸塾、衮冕等，虽皆为华夏之古制，然能依托经典旧文，而实施精作之，则不藉西域之工艺亦不为功。夫大兴、长安都城宫市之规模取法太和洛阳及东魏高齐邺都南城，犹明堂、车服之制度取法中国之经典也。但其实行营建制造而使成宏丽精巧，则有资于西域艺术之流传者矣，故谓大兴长安城之规模及隋唐大辂、衮冕之制度出于胡制者固非，然谓其绝无系于西域之工艺者，亦不具通识之言者也。总而言之，若技术人才出于胡族，则必于西胡而不予东胡求之，盖当古时代吾国工艺之发展实有资于西域之文明。”

建筑是一个文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一个文明的建

筑风格体现了这个文明的深层文化结构，西域风格的建筑元素融入中国建筑是多元文明互动的体现，由此可见西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深层次影响。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对流寓长安的粟特人以及他们对唐朝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进行详细研究，为我们展示了长安多元文明汇集的恢宏画卷，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唐朝都城长安弥漫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珍奇和诱惑。文明之间的互动总是伴随着物质上的交流，人们对域外物种尤其是本土缺乏的物种尤为热衷，我们从出土的唐代西域文物可以想见，外来的每一种事物所影响的生活都如此精致，使我们发自内心地去向往。

西域是多元文明角逐的沙场

西域在唐朝维护政治稳定方面作用十分重要，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唐关中乃王畿，故安西四镇为防护国家重心之要地，而小勃律所以成唐之西门也。玄宗之世，华夏、吐蕃、大食三大民族皆称盛强，中国欲保其腹心之关陇，不能不固守四镇。”可见唐朝经略西域并非好大喜功，而是出于战略安全的需要。

唐朝与西域的关系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唐朝初期西突厥在西

域势力强大时期，此时安西都护府草创，唐朝开始经营西域。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侯君集消灭高昌国，在其地设西州都护府。同年九月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设安西都护府，以备西突厥在此地扩张势力。二是从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到安史之乱爆发的安西、北庭都护府时期。尤其是显庆（656—661）、龙朔（661—663）年间，唐军平定西突厥之后，安西大都护府的管辖地迅速扩大，包括安西四镇、西突厥故地、昭武九姓、吐火罗以至波斯都督府，大致包含相当于今日的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亚五国以及阿富汗，唐朝在西域的行政体系趋于完备，此时唐朝在西域的实力达到鼎盛。然而由于地缘上的冲突，这一时期吐蕃开始与唐朝争夺西域地区，甚至在咸亨元年（670年）曾一度攻陷安西都护府。三是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与吐蕃争夺西域直至吐蕃占领西域，中晚唐时期唐朝对西域的控制逐渐式微，直至退出西域。

西域既是文明互动的熔炉，也是文明角逐的沙场。唐朝对西域的重视和经略，正是国家整体安全的重要环节，综观历史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启示。

中华春秋

当前，在万众一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历经五千多年漫长岁月而传承至今的中华文明，能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提供渊源于悠久历史的充沛底气。首先，这份充沛的底气，源自于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连续性。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同根同种且以国家形态持续至今的伟大文明，不论是文化价值、制度体系还是社会结构，都没有出现大的断裂。环顾历史不难发现，中华文明并不是诞生最早的文明——我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五千多年，而其他文明有的产生于距今六七千年前。但是，中华文明的历史一脉相承，一直绵延至今。而其他的文明，尽管曾那么辉煌，却都中途断了线，有的成为永久之谜，有的成为千古之憾，化作和现在没有什么关系的文物，只能在博物馆中被人欣赏或凭吊。因此，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说：“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不过，强调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并不意味着说它一直平稳发展，线性上升。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有高峰也有低谷，甚至一次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华文明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不断迎接挑战，战胜危机，通过螺旋式上升，一次次走向新的辉煌，从而在悠久的历史中整体延续着中华文明的元气与生机。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古老的大门，国人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进行反思，甚至陷入文化焦虑与文化危机。为挽救危机，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更是在实质平等的基础上奠定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使中华文明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一个古老文明应有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其次，这份充沛的底气，立足于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包容性。

中华文明虽植根于中华大地，但自古以来就不是封闭僵化的，而是一个充满活力、不断汲取内外多维文化、海纳百川的开放系统，善于“和而不同”，乐于“成人之美”，在文明性格上从不愿意强加于人，从不推崇武力征服。在面对他者、面对异质性要素的强力冲击时，中华文明总是试图去尊重之、理解之、吸收之并融化之。中华文明的“大一统”传统强调“至大无外”——“无外”不是封闭排斥，而是在历史实践中不断与外部交



流交融，消融现实的差别和对立，最终化外为内，四海一家。比如，面对佛教东传带来的强劲挑战，儒道两家都有过排佛之举。但是，随着相互之间的交往和交流，佛教吸收中华文化的现世特性，在中唐以后形成禅宗；儒家则在吸纳佛教理论的基础上，形成更加精微细密的宋明理学；道家也结合百姓当中同时存在的消除业罪与健康长生的心理需求，而与佛教互为表里，利益群生。到明清时代，最终形成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格局。

到晚清时期，新的“中西”问题逐渐凸显，那就是代表着现代文明的西方传统所带来的强势挑战。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交锋、吸收、融合的过程。由此，中华文明不仅成功应对了西方的强势挑战，而且实现了现代的更始重生，也实现了更高层次的文明包容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五千多年来，中华文明遵道而行，含弘光大，继往开来，自信而从容地创造出一次又一次的灿烂与辉煌。当我们以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历史作为底气，高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就能取得更大的胜利，创造更新的辉煌。

黄老之学的出现与应用

黄老之学，是战国中后期兴起的一种包含养生方法与治国理念的学说。它托名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既提倡因时势调养身体状态，达到顺天应人的境界，又融合了老子提倡的清静无为的主张。这一学说，形成并兴盛于齐国，后传至秦国。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中，已经能见到黄老之学的主张。

虽然黄老之学强调君主选用贤相，无为而治的虚君政治，但是这一主张，并没有为秦始皇和秦二世采纳。反倒是经历了秦末战火洗礼的汉初君臣，在选择国家的主导方略时，考虑到了黄老之学。

汉高祖刘邦曾以为自己马上得天下，无需采纳什么学说治国，只要“白马治之”就行了。其实是想走军事威压的路子。他身边的谋士陆贾则劝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实际是提醒刘邦牢记秦亡的教训。

那么，新造之汉应以何为治呢？刘邦委托陆贾规划统治的蓝图，陆贾完成了十二篇文章进呈。刘邦每读一篇都大为赞赏，左右高呼万岁为贺。陆贾这十二篇文章结集在一起，叫做《新语》，反映了汉初君臣咸与维新的气象。汉代的目录学著作《汉书·艺文志》将《新语》归入《诸子略·儒家类》，即认为此书反映了儒家的观点，诚然不错。不过《新语》中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包含了一些黄老思想，也应引起人们的重视。

《新语》开篇名为《道基》，其中提到“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新语·至德》：“欲建功兴誉，垂名烈，流荣华者，必取之于身”，重视道术和身体、政治间关系，有明显的黄老色彩。如此看来，刘邦赞赏、布衣将相们称道的主导方略，是一个夹杂着儒学主张与黄老观点的集合。

按照黄老治道，君主应尽量减少对国家生活的干预，让民尽其力，物尽其流，实现天下大治。用今天的眼光衡量，就是充分发挥民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长期战乱结束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无疑对恢复社会秩序、复兴经济生活，有极大的效力。很快，汉朝的元气逐渐充盈，民众的生活也走上正轨。

萧规曹随

萧何与曹参都是白芒碭山就追随刘邦左右的老臣。萧何文主，曹参主武。两人都曾在反秦灭楚战争中立有大功，也正因为资历接近，功劳相当，两人之间难免有几分芥蒂。然而，在关涉国家治理的大问题上，两人却都自觉将国家的利益摆在首位，唱了一出汉代的“将相和”。

汉朝建立之初，以萧何为相，曹参则前往齐国为相，辅佐刘邦的庶长子刘肥。萧何主持了新都长安的营建

黄老治道与汉初政治

□ 曲柄睿

工程，保证了新政权一系列工作的开展，可以说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萧何临终之前，刘邦之子汉惠帝问他：“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萧何曰：“知臣莫若主。”惠帝问道：“曹参如何？”萧何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萧何胸襟大度，非常人所及。司马迁评价萧何“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是肯定他在创业时期的贡献；又说他“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闾天、散宜生等争烈矣”，则是肯定萧何对汉朝政治的长远影响。

无独有偶，远在齐国的曹参听说萧何亡故的消息，吩咐左右即刻收拾行装。他预感到，自己不久将赴长安为相。果然，使者很快就将诏令传达到曹参处。到了长安以后，曹参终日在相府中饮酒宴会，不过问政事。每有下属请示他某事该如何施行时，曹参竟劝对方一同痛饮，大醉之后，请示也就不了了之。

汉惠帝对曹参的举动很费解，便让在自己身边服侍的曹参之子曹窋回家试探着问：相国为何不理事，是欺负皇帝年轻吗？曹窋据实问了，反被曹参打了板子。惠帝只好自己问曹参。曹参诚恳地问惠帝：“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惠帝回答：“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曹参又问：“陛下观臣能

孰与萧何贤？”惠帝回答：“君似不及也。”曹参给出了他的答案：“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至此君臣相得，和好如初。

曹参之所以愿以萧何之规划为政，与他在齐国接受黄老之学密不可分。齐国是黄老之学的发源地，曹参甫到临淄，就拜访当地高人盖公，得到了“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建议。他以此为从政圭臬，并将其带到了长安。

萧规曹随，得到史家的认可。《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了民众赞美二人的歌谣：“萧何为法，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班固评价萧曹“二人同心，遂安海内”。西晋荀勖曾提到“昔萧曹相汉，载其清静，致画一之歌，此清心之本”。后代往往以萧曹并举，作为贤相的代称。非但看重两人不计前嫌，更是对两人在选择政治方略时顺应时代需求，而能压抑自己欲望的肯定。

尊崇长者的风气

黄老之学崇尚清静无为，落在在政治领域，特别推崇那些谨厚寡言，

无争好让的谦和之士，这批人被称为“长者”。

汉文帝有次到宫中饲养猛兽的虎圈，询问上林苑的副长官上林尉有禽兽几何，每日开销几何，上林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而他身边管理虎圈的啬夫，敏捷善言，将文帝所问陈说得清清楚楚。汉文帝当即要撤掉上林尉，以虎圈啬夫代之。文帝身边的张释之出言阻止，以为上林尉乃是长者。他援引亡秦为例，所谓“秦以任刀笔之吏，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导致“不闻其过”，二世而亡的后果。如果文帝“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则“天下随风靡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尊崇长者，实际是希望人们能学习长者务实、尚简、崇让、宽厚的品行，使整个社会风气能够缓和下来。

小至虎圈，大到国家，都以少言少行为美。汉文帝即位之初，任命汉高祖刘邦的功臣陈平、周勃为左右丞相。因为周勃在拥立文帝即位一事上立有大功，故以其为右丞相，地位较陈平为尊。一次朝会，汉文帝问周勃国家一年司法审判有多少、财政收入有多少，周勃不能回答，以致“汗出沾背”。陈平则说各有主事者。文帝追问，既然各项具体事务有主事者负责，丞相日常又应该负责什么工作呢？陈平回答道，宰相的职责为“上

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对这样的回答，文帝很是欣赏。

上林尉、虎圈啬夫和陈平、周勃的事例表明，汉初政治强调人各安其位，各尽其职，思无自位，无越其职，让各行各业顺应自有的发展态势运转，减少人为的干预。

汉初推崇黄老治道，尊重长者，出现了一批宽和的官员。前文提到的文帝时期周勃、张释之、石奋石健父子，景帝时期的卫绾、直不疑、张敖，以及后来到武帝时期的汲黯、郑当时，莫不在顺应法律的同时，又参考人情，使秦法遗留下来的尖锐的社会冲突逐渐被化解。其实，汉文帝与汉景帝父子又何尝不是谨厚长者。他们能克制自己的私欲，从善如流，使汉初的政治生活多了几分温情。

由此，汉代的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很快就步入正轨。《史记·平准书》记录下汉初到汉武帝时的重大变化：“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僭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耻耻辱。”这一变化，就是汉初几代君臣共同努力的结果。推崇黄老治道，尊崇长者，与这一历史转变密不可分。

两汉风云